

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。上海文人们回想起小时候各自跟着乡亲们一起抗日的往事，犹在眼前。



陈进鹏(左二)与老战友合影。

抗日战争时，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小孩子的心思和大人一样：日本鬼子上门来了，我们为保卫家乡，组织起来跟鬼子干，决不让鬼子在我们国土上横行霸道。

我出生在1932年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，号召全民抗战。我的家乡在山东潍县(今为潍坊市)。抗日期间，母亲带我到了我党领导的寿北抗日根据地上学。抗日根据地的男女老幼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组织了起来，都为杀敌救国保家乡出力。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孩子组织起了抗日儿童团，与父辈们一起肩负起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，许多青少年积极要求参军参战，在炮火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。在参军热潮中，一个村就是一个排、连，村长当排长或连长，一个乡就是一个营，乡长当营长，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。

那时，根据地按照我党胶东和清河区委的决定，各村还建立了抗日少先队组织。儿童们人人勇当抗日少年先锋。当时有首儿童团唱的《我爱枪》的歌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，自己编创的。大家非常喜欢唱它，走到哪里都在哼。歌词是这样的：我爱枪，我爱枪/儿童团员把它扛/别嫌小俺身体壮/能站岗能放哨一心保家乡……

站岗放哨保家乡

我当时十一岁，是村上的抗日儿童团长。八路军叔叔常住到我们村上，村里有自卫团(解放战争时期改叫民兵团)，自卫团是党领导的村武装组织，我们叫他们“民兵哥哥”、“民兵姐姐”，他们出来进去都背着枪，很威武，我们心里很羡慕。在他们的组织和带领下，我们这些儿童团员都有一杆红缨枪。有的则拿着自制木质手枪，学着八路军叔叔的样子。记得有一首红缨枪的儿童歌，在内容上与红军时期的《红缨枪歌》有所不同，这首《红缨枪歌》是这样描述的：红缨枪，红缨枪/枪头闪银光/打东洋，保家乡/莫叫鬼子逞凶狂！

在抗日的旗帜下，儿童团、姐妹团、妇救会、青救会、自卫团各有任务。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，盘查行人。我们儿童团员轮流在村口站岗，爬在大树上或站在围墙上屋顶上放哨，发现敌情，马上报告村干部。因为我们村离敌人据点比较近，鬼子、汉奸经常来扫荡骚扰，站岗放哨，盘查行人，查路条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不能间断。那时有条规定，陌生人不允许进村，为的是防备坏人看到村民挖地窖藏粮，刺探我部队驻防的情况。

我们儿童团员小志气大，不仅在路口站岗放哨，查路条，盘查行人，还协助自卫团捉汉奸、抓特务。我们发现坏人和鬼鬼祟祟有嫌疑的人，就把他弄到团部去，交给民兵哥哥处理。在那支援前线的热潮中，大娘大嫂一针一线在煤油灯下为部队纳拥军鞋，我们帮助妇救会去大娘大嫂家把鞋集中起来，以便送往前方部队。

当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在小学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，走村上集，在墙上刷标语、贴标语，写的标语口号如“抗日爱国，参军光荣！”、“拿起武器与日本鬼子干，决不做亡国奴！”、“奉劝汉

奸们改邪归正！”等等，还作讲演，唱抗日歌曲，说顺口溜，成为村上的一支抗日少年宣传队。根据地军民创造的埋地雷炸敌人的方法有多种，什么拉雷、线雷、踩雷、趟雷，还有梅花桩雷、连环雷……当时有一首儿歌的歌词是：轰，轰，轰/地雷开了花/天上飞起了大洋马/鬼子的脑袋搬家了，搬了家……

村干部、民兵和部队首长都夸赞我们是“小孩子干大事！”

风筝暗语报敌情

“春节飞鸢(风筝)”是我们益寿临淄地区的一种民俗。记得1943年春节，八路军清东军分区的部队开拔到我们村里，为的是开展“双拥”活动，发动群众参军，扩大县区武装，消灭日伪军。我们儿童团像往常春节到来一样，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拿着家里扎制的风筝，三三两两地到村外坡地上放风筝。我们是边玩耍、边侦察敌情。这是村干部交给儿童团的一项任务。

离我们村向南二三十里路，有个日伪军据点。我们是抗日儿童团，处处想着怎么协助八路军拔掉这个祸害老百姓的据点。因为这里的日伪军常下乡扫荡，特别是节日更加猖狂，到各村抢粮食，拉民女，无恶不作。我们就按照村干部教的办法，用不同样式的风筝，距离有远有近，相隔几里路左右，在不同的地方放飞，看到日伪军踪影了，就把风筝高度放低，直至收线；如看不到我们放的风筝了，就说明敌人出动的消息是确实的。如果哪里风筝收线就是告诉你：敌人已经到了那里。

这次放风筝，在晌午过后，我们终于发现一小队伪军从南向北来了，我们立即用风筝暗号向村里的民兵报信。八路军和武工队早有准备，就用机枪把这些日本鬼子赶回了据点，保卫了家乡人民过好春节。事后，部队首长说“真是儿童抱成团，鬼子奸见了也胆寒”，夸奖我们是抗日的少年先锋，抗日的小情报侦察员！

勇当抗日少年先锋

从1945年初开始，国内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全面反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13岁的我，被母亲送到部队上参加了八路军，实现了自己一门心思想扛枪打鬼子、干革命的愿望。因为我年龄小，起先部队安排我到文艺宣传队，我不愿意去，又叫我去卫生队，我也不愿意去，硬是哭着闹着要扛大枪打鬼子。我个子比较高，首长很喜欢我，就到了县委警卫连，当起了公安局长的通讯员、警卫员、武工队员、宣传员……后在人民解放军任职，从194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，跟随部队南征北战，过黄河、渡长江，直到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，转业到地方工作……

抗日战争期间，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，活跃着一支又一支有组织的抗日儿童团队伍，他们帮八路军、武工队、民兵队、妇女队干了不少事情。那时儿童团员们人人争当抗日少年先锋，大家感到做一名抗日儿童团员很自豪，都会骄傲地竖起大拇指说：“我们是抗日儿童团员！我们要当抗日的少年先锋！”

在抗日烽火中成长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艾以

1937年7月7日夜，日军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，中国驻军奋起反抗，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。这一年，我刚好10岁。时间虽然已经过去65年，我也成了一位耄耋老人，垂垂老矣。但当年的非常情景仍记忆犹新。

记得我小学毕业，跨进中学大门时，正是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，江河破碎的最最艰难的岁月。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省城杭州后，很快我的故乡金华、龙游相继陷落。我们的学校只能搬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偏僻农村去上课，日寇随时都可能下乡来扫荡，形势十分险恶。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难，生活异常艰苦。虽然我们正处在成长期，需要足够的营养，但在非常时期，温饱难求，还谈什么营养。记得当年我们每天一稀二干，不是素菜，就是萝卜，豆腐渣，能吃上一顿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。记得每星期四午餐能开一次荤，这对同学们来说，就像过节一样快乐。抗战时期的学校生活处于半军事状态，就是吃饭也有严格的纪律，不准迟来早到，必须秩序井然排队进入食堂。八人一桌，由值班同学一声令下，全体同学开始用餐。时间一到，又是一声令下，全体同学一齐放下碗筷。

当年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困难，真是一言难尽，就以当时我们的夜自修课来说，不要说电灯，就是现在早已进入博物馆的煤油灯也用不上，那是当年富贵人家才拥有的灯具。一般老百姓、包括我们夜自修，只能用以灯草引燃的桐油灯，九个同学一组，围坐在一盏桐油灯微弱的灯光下。有时做作业，书本簿子挤作一团，手碰手，脚碰脚，身外那样艰难的学习条件，同学们谁也没有怨言。第二天一早起床，同学们的鼻孔都被桐油灯熏得黑黑，彼此相见时，真是哭笑不得，调皮的同学还会做个鬼脸以解嘲。

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，当年同学们在炮声隆隆不绝、敌机经常骚扰的情景下坚持读书、照常上课的经历。在一段时间里，敌机几乎天天空袭不断，学校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学业，不影响学校的教学进度，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来，敌机来时，马上发出空袭警报，同学们即以班级为单位，由年长体健的同学背上一块黑板，在老师带领下秩序井然地疏散到指定的树林里隐蔽起来。头顶上敌机隆隆作响，树林里则琅琅读书声不辍。这就是抗战时期的读书生活。虽然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读书生涯早已成为历史，但每当我想起65年前的这段往事时，心头不禁会涌起一阵激情和自豪！

八年抗战，摧我成长，抗战八年，摧我成熟！那时的我，虽然还是一个幼童，一个中学生，但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，我们照样责无旁贷，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运用各种形式，鼓励民众，宣传抗日，以满腔的爱国热情，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的洪流中去。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抗敌剧团，我成了这个剧团的积极分子。这个剧团成立后，曾演出多部抗日活报剧外，还演出了两部大型话剧和一新歌剧。我在三部话剧歌剧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。

记得当年我们的抗敌剧团走出校门，到各地巡回演出，鼓舞民众，宣传抗日。话剧《杏花春雨江南》写的是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关头，沦陷区的广大同胞，呻吟在敌人的铁蹄下，受到苦难和煎熬，但仍坚持着斗争。《杏》剧的编剧就是著名戏剧家于伶同志，解放后他一直在上海担任文化界的领导工作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他还当选为我所在单位——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，我曾和他提起当年我在学生时我曾演出《杏》剧的往事，他显得十分高兴，并和我谈到当年他创作这部话剧的一些往事。

歌剧《农村曲》写的是农妇王大嫂耳闻目睹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之后，送子参军，杀敌报国的故事。我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王大哥，女主角王大嫂由一位女同学担任。这位女同学为了抗日，她一反生活中矜持、内向和寡言的性格，竟也“抛头露面”走上舞台，由此可见同学们当年抗日热情之高。 [图]



抗战街头活报剧。

炮火中的抗日少年先锋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陈进鹏